



“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座谈会（上）

(2006-4-12 14:22:20)

【编者按】2005年10月27日，由杜维明先生提议，由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会议室召开了“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十几位学者就“思孟学派”、“仁内义外”、郭店竹简中“情”的内涵以及郭店儒家简的学派归属等问题展开了探讨。现摘要发表部分讨论内容，供学界同仁参考。

杜维明（哈佛—燕京学社）：

我对孟学很有兴趣，这种兴趣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中庸》的思想代表思孟学派的发展。现在郭店竹简这些材料出现后，关于孟子学说是不是有了更多的资源？以前有些出土文献，如《五行》，被认为是孟子后学的作品，其实应该成为孟子学术上的资源。这样就产生了许多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自己本身没有做研究，至少没有很深刻地思考，只是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我觉得很难得。

另外一点，我想提到问题意识。对于孟学，特别是孟子思想，到底掌握了些什么资源，才使得成为我们一般所说的心性之学。如果把孟学当作我们的研究对象，我想它所掌握的学说或思想的资源，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前很多学者谈到过，孟学里面有非常强的主体意识，就是主体性的问题。主体性，我用这个概念，很有争议。不管从他讲的“大体”、“尚志”，特别讲自得，这里面主体性的观念非常强。但是他这个主体性和西方所讨论的subjectivity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一般大家都承认民本思想是孟学的重要特点，因为孟子有民本思想，所以他有强烈的抗议精神。但是不是仅仅只是民本思想？它后面的根据是什么？这方面，他还有一个深刻的文化历史抱负，对于这些还需要做出进一步分析。

再有，大家比较熟悉，但是现在讨论起来比较困难，就是他的超越思想。“尽心知性知天”，我们叫内在的超越，现在在西方引起很大的争议。还有“浩然之气”的观念，“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等等。

我曾经写过《孟子和士的自觉》。我写那篇东西，是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说，孟子学说的基本精神是为士的地位和使命做一个最全面的理解和说明。这是从社会分工的观念上来说的。我说儒家的传统，如果从孟子来看，是重农而不轻商，和法家的重农轻商完全不同。法家讲耕战，孟子则讲士农工商，商通有无，工制造，农耕作，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难的是要说明为什么要有士。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他从有恒产有恒心，到无恒产有恒心的观念中建立起一套士的自觉的思想。这里面就牵涉到很多的方面，他有他的主体性、社会性、历史文化的意识，同时有他的超越性，他的心性之学包括的范围是非常广的，经世致用之学、文化历史意识等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考虑这些资料到底是不是属于思孟学派，或者是不是有思孟学派？但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孟学所体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因为按我的理解，假如郭店的这一批资料考古学界公认在孔孟之间，那当然它也是荀学的源头。我觉得根本没必要争论是属于孟学还是荀学，它根本就是源头。反正在这以后，都可以从它那里得到源头活水。

麻烦的是，如果子思确实是孔孟之间的重要中介，从这些资料中体现出来的哪些思想可以看作子思所代表的思想形态。

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一方面是非常严格意义下的文本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讨论得比较深刻了，没有人会否认这些材料和思孟学派有很密切的关系，大概也很少人会接受李学勤先生讲的都是思孟学派的，这中间的分歧已经很多了。另外，它和荀子以及其他的学派是什么关系？我相信思孟的谱系也不仅是曾子和子游。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拿来讨论。我觉得郭店简出现后，孔子第一代弟子中虽然有些人还没有发出声音，但至少像曾子、子夏很多人的声音已经被我们知道了。我一直还有这么一个怀疑，就是如果子思有那么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基本上被人们淡忘了？如果孟子和子思的关系大家都不能确定，那么子思到底代表什么思想？曾子的情况我们比较熟悉，另外，子夏还有子游代表了什么思想？大家都认为子思跟《中庸》以及《缙衣》、《五行》有关系，这些能不能成立呢？

如果孔子的孙子确实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从子思和鲁穆公的关系可以看出，那么，这么重要的人物居然在儒学发展的谱系中逐渐被淡化。我觉得这方面更能体现出儒家在开始的时候是相当开放的一个学术体系，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他的奋斗、努力参与进来，没有很狭隘的家规、家学的传统。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因故未能出席，此为他提交的书面发言稿，由陈来先生代为宣读）：

郭店竹简，除《老子》、《太一生水》以及《语丛四》外，余皆属于“孔孟之间”的儒家文献，这一点可以肯定。观这些儒家文献，其与子思、孟子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也可以肯定。我觉得思孟学派（或子思、孟子的思想）如同战国前、中期儒家思想的一个枢纽，郭店儒家文献的思想都向着这个枢纽“辐辏”。这些思想有的与思、孟的思想非常接近或相同，但有的也与思、孟的思想“相出入”。因此，我不认为这些文献都属于子思学派或思孟学派。

《缙衣》、《鲁穆公问子思》等可以归入子思学派，但以下郭店文献与思、孟思想“相出入”的情况也值得重视：

1. 《性自命出》重视“情”，持非性善论的观点。
2. 《五行》篇与《中庸》较接近，但与孟子的“四德”有出入，帛书《五行》则又有向孟子靠近的倾向。
3. 《穷达以时》的思想与《中庸》的“大德者必受命”相矛盾。
4. 《唐虞之道》的“禅而不传”思想与孟子的“禅”与“传”两可、“其义一也”相矛盾。此篇与《礼运》篇的“大同”“小康”之说也不同；若子游学派传《礼运》，则《唐虞之道》与子游学派的思想也有差距。
5. 《六德》篇的“为父绝君”与《礼记·曾子问》的“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相矛盾，故《六德》篇不属曾子学派。《六德》篇的“仁内义外”与孟子思想也不同。

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内部之间也“相出入”。如《五行》篇构建的道德体系是“仁、义、礼、智、圣”，《六德》篇构建的道德体系是“圣、智、仁、义、忠、信”，《忠信之道》则又强调忠、信是“仁之实”、“义之期”。此三篇必非一人或内部关系较近的一个学派所作。

鉴于以上情况，我认为郭店儒家文献的学派归属当不是很集中的，而是比较“分散”的。郭店儒家文献与子思、孟子的思想都有很强的政治批判意识，这与“孔孟之间”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系（《孔丛子》所谓子思之“抗志”，“有傲世主之心”，“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参见《孔丛子·居卫》）。当这种历史环境到孟子生活年代又有变化时（如出现了燕国的“让国”事件、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崛起），这些比较“分散”的思想就大多归宗于孟子。孟子可谓战国中期的“圣之时者”、“集大成”，凡未入孟子思想者就大多沦于消歇，只是到战国后期儒家才又歧出荀子的思想。

梁 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我想补充李老师的观点，他说《缙衣》和《鲁穆公问子思》可归入子思学派，这个我非常赞同。但他没有把《五行》篇归入进去，理由是它与孟子的思想有出入，这个我觉得不能成立。因为李老师在这里实际有个假设，就是子思和孟子的思想应该是一样的。现在《五行》和孟子的思想不完全一样，所以就不能是子思的了。但这个假设实际上是不成立的。《韩非·显学》篇谈“儒分为八”时，说有子思之儒、有孟氏之儒等等，说他们“取舍相反不同”。这就是说，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子思和孟子的思想是不完全一样的。

陈 来：（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插一句，“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孟子也可以赞成五行。另外《五行》篇里也讲“四行”。

梁 涛：

在《五行》里面，谈到了“形于内”和“不形于内”这两个方面，孟子更侧重“形于内”这方面。李老师后面说“帛书《五行》则又有向孟子靠近的倾向”，我觉得他说的是帛书《五行》的“说”，这个可能是比较晚的了，郭店简里也没有发现。《五行》的“说”用“四端说”来解释《五行》的思想，“四端说”是孟子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学说，我认为帛书《五行》的“说”可能是比较晚的，很可能是孟子后学的东西。

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我觉得学派的问题是后人总结出来的。我们讲一个东西总要对其有个形式的把握，比如宋明理学，我们现在讲心学、理学好像水火不相容，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里边有很多交叉的东西。朱熹讲的“心”，我觉得比心学讲得更好。我觉得应该看孔孟之间有没有一个大致的趋势。至于思孟学派内部可能也是有发展的，我们现在有些学派，老师和学生之间观点不见得都一致，但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归到一个学派里边。因此，我们不能根据这里边有些不同的地方，就说他们不是一个学派。

陈 来：

梁涛好像有一篇谈论思孟学派的文章，我忘了在哪看到的，你对思孟学派是怎么看的？

梁 涛：

是在《中国哲学史》上。我那篇文章是说，所谓思孟学派实际是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合称，因二者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将他们联系起来，称为思孟学派。因为《韩非子·显学》谈“儒分为八”，说有子思之儒、孟氏之儒，完全就是把它们当作两个独立的学派看待的。《荀子·非十二子》虽然将子思、孟子并列，说“子思唱之，孟子和之”，但也并没有肯定他们就是一个学派，因为《非十二子》中批判的其他几位人物，如它嚣与魏牟，陈仲与史鳧，墨翟与宋鉞，慎到与田骈，惠施与邓析等等，也是由于其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或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关闭窗口\]](#)